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 与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杨 豹

[摘要] 传统爱国主义有其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爱国、爱国主义和传统爱国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入手,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忠君爱国;民族至上;整体利益;忧患意识;强国意识。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复兴的源泉,是面临价值多元化背景中民族团结的纽带,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动力之源。另一方面,正确认识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也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爱国主义中愚忠以及狭隘性、情感性为主导的一些缺陷。

[关键词] 传统爱国主义;价值;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2010)04-024-07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爱国主义是人们对于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以及为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体现着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的高度责任感和理性自觉。^{〔1〕}爱国主义在中国具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当前,正确认识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克服其中的一些缺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

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从爱国、爱国主义和传统爱国主义三个词汇来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古往中來,爱国都是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已存在的千古不变的主题。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主张爱国

都把爱国当作一种最伟大、最崇高的思想感情。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爱国”二字很早就出现了,《战国策·西周策》中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中则提到“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由此可见,早在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爱国的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爱国主义与爱国不同。爱国是指热爱祖国的故土家园、人民群众的心理情感和外在行为。因此,爱国常常会是感性的、具体的、零散的。爱国主义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爱国的情感与行为的理性升华,是对个人与祖国两者关系的理性认识,是热爱自己国家或民族的情感、意志和行为的统一。

就爱国主义的产生而言,列宁曾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

〔基金项目〕本文系龚群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个重大关系研究(批准号:08-2D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0-01-25

〔作者简介〕杨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教师。湖北武汉 430074

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① 它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尽管对于爱国主义的定义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实际上，列宁指出了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即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同。历史的发展是有其一般规律的，爱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按照时代内容来分析，爱国主义可以大致分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和现当代的爱国主义两个阶段。

那么，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具体而言，它包括忠君爱国；民族至上；整体利益；忧患意识；强国意识。

其一 忠君爱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讨人类社会由蛮荒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时，认为存在两种方式：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古典的古代”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有制冲破了氏族组织，国家代替了氏族。“亚细亚的古代”则是由氏族直接转化为国家，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血缘氏族制相结合。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就属于“亚细亚的古代”方式。它是在保留原始氏族组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社会。按照史学界的通行见解，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标志着中国进入文明社会。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两个最根本的事实。第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横向的网络形式。维护宗法关系，成为稳定人际关系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途径。第二，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与作为国家政体的君主专制统治的高度集中。要使分散的自然经济得以存在、巩固，就必须加强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反过来，要维护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加强对分散的自然经济的控制和

调节。^②

中国古代社会中两个最根本事实的存在，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了“家国同构”。以父家长制为中心的宗法制，即所谓“宗统”，不仅稳定一家一户的社会结构，也维护着君主的“家天下”，即“君统”。“宗统”和“君统”，“家”与“国”的彼此沟通，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宗法体制。而以适应这种宗法制而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构成了所谓“道统”。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王位而成为君王。这样的君王，不仅是天下的“大宗”，享有祭祀祖先的特权，而且也是天下的共主，拥有天下的土地。君王实际上成为土地和家族制度的代表。由此，这就会必然推导出天下统一于君主的“大一统”理论。从春秋时期孔丘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一统于天子”都在诠释“大一统”理论。自秦始皇统一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的理论首次成为现实。既然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又是天下土地的主人，那么，天子，或君主即代表国家，天下万民为君主的子民，天下土地为君主的土地。天下万民和天下土地就服务于君主。于是，人们对于祖国，对于他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意识和维护其生存发展的责任意识，自然地转变为对君主的忠诚意识。这样，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要忠君。可见，正是由于“家国同构”，爱国不可避免地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忠君。“忠君报国”成为了主流文化中传统爱国主义的有力诠释。所以，屈原慷慨悲歌：“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岳飞在《满江红》中力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爱国与忠君在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密切联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当然，在先秦时期和以后的一些非主流思想

^①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收于光明日报，1985年10月13日第三版。这句话曾被误译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情感”，并作为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而广泛使用。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室曾集体撰文指出：“误译之处有二：第一，没有把‘彼此隔离’这个关键词译出来；第二，译为‘对…的感情’，是把原文的语法关系搞错了”；“旧译文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把‘如何形成’的思想表达出来，在这里，能否把‘如何形成’的思想体现出来，‘彼此隔离’一词起着关键作用。”该文还指出：“从列宁的思想看，他在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同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爱国主义”或称“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感情”，因为列宁紧接着就谈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所以，列宁此处所讲的爱国主义并非试图给它下定义。

中 忠君爱国,并非如此密切。比如 孟子不大讲忠。《孟子》一书中,“忠”只出现了八次。在孟子看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土管,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主与臣民之间存在着浓厚的道德上的平等关系。臣子杀死暴君也不为过,如武王伐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认为,“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夫是之谓权险之平,汤武是也。”(《荀子·臣道》)这些显然与宋代所言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思想有很大的区别。而黄宗羲所提出的“以天下为主”和“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其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民主主义的萌芽,与传统中主流的忠君爱国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 民族至上

由于我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西方古代国家,走的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如果从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古代国家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在古代文明形成和国家诞生的过程中,先民们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河流域地区,东临茫茫太平洋,北有漫漫戈壁,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只有其腹地相当开阔,具有回旋和发展的余地。如此地形特征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恰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正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隔绝机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爱国主义。一方面,“隔绝机制”促使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能够一以贯之,而不是如同印度文化、埃及文化形成了某种断层。同时,它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惰性”,缺乏竞争性。另一方面,“隔绝机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向心力。依赖土地而生的黄色文明使其人民深深地眷恋着脚下的土地,容易化为一种一致对外的团结精神,视外来事物为“夷狄”或“异端”。从而,它造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至上性,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传统爱国主义中荡漾着浓烈的民族至上性,但有时这种民族至上性,容易使民族自尊异化为一种妄自尊大的偏狭。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至上,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所谈的民族至上性是中华民族的至上性。它是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各个民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的。我们应该看到,统一的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民族都曾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尽管在民族分裂时期,不同民族都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过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都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祖国,其爱国带有其自身的民族性,但它包含着彼此融合、共同前进的基因,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中民族至上性形成的前提。从历史上看,秦王朝“奋六世之余烈,挥长策而驾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实现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而使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语言、地域和民族心理的一个整体民族。秦亡汉兴,历时四百余年,巩固和发展了自秦以来开创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光元年,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确立了与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的儒学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所特有的“道统”,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繁荣,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秦汉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使得民族与国家之间有了直接的同一性,二者的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把中华儿女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突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至上性特征。从秦汉到清的二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内聚式的越分越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尽管传统爱国主义中的民族至上性在其形成和发展中,有时是以局部的乡土之爱 and 单一的民族之爱为基础的,譬如“宋金世仇”,“辽金世仇”,等等,但这些矛盾、冲突甚至激烈的战争,在一定意义看都只是各个民族之间民族爱国情感的碰撞。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主流——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突出整个民族利益的至上性。正是这种民族至上性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转变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三 整体利益。

与民族至上性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追求整体利益的实现。从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最为根本的事实来看,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和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既相互依附又相互对立: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家族和

国家的利益 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和从属于家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为, 以土地为基础、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非常重视家族、宗族、国家对个人的限制和支配, 强调个人对家族、宗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因而在群己利益关系中, “无我”、“无私”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和核心。所以在伦理价值观上, 中国传统价值文化强调“群体意识”的整体利益, 或者称之为道义至上, “正义不谋利”。“义”即为宗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反映。“利”即为个人私利。“义利云者, 公与私之异也。”(《粹言·论道篇》)

实现“公天下”的整体利益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天赋人权”的观点, 但还是能够见到“天赋价值”的思想。“天生我才必有用”强调的就是个人天生所具有的个人价值。只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法制和君主集权制的存在, 导致个人价值与宗族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 个人价值就只有通过实现宗族和国家的群体利益得以表现, 从而也就从另一方面决定了人们非常重视群体利益, 置群体利益于个人利益, 乃至个人生命之上, 强调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提倡为国争光, 为国奉献。个人因为家与国的存在而有了其自身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而是天下为公, 融自我于家、国、天下之中。所以,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仁人志士的一种爱国主义的社会责任感。尽管这种单纯追求整体利益的思想, 在一些方面压抑了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发挥, 为一些人所诟病, 但是, 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 正是在这种浓烈的爱国主义的社会责任感中, 无数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兴亡, 位卑未敢忘忧国, 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义以为上”, 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勇于“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无论霍去病的“匈奴不灭, 何以家为”, 宗泽的“得捐躯报国恩, 足矣”, 还是戚继光的“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 邓世昌的“吾辈以军卫国, 早置生命于度外”, 都充分反映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族精英实现整体利益的爱国主义选择。

其四, 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 民族至上性和实现整体利益, 经过历史积淀而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形成了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而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又激励着中华儿女

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与个人密切联系起来, 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 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如果从历史上看, 忧患意识也是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 它就是一部饱经忧患的历史。“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国”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 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从“乾隆盛世”到“咸丰乱世”, 中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所经历的兴盛与衰亡, 都证明了丧失忧患意识, 陶醉于一时的繁荣稳定, 看不到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危机, 最终导致盛极而衰。而“居安思危”则能“定其业也, 有始有卒”(《贞观政要·灾祥》)。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 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来自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周游列国, 以求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道言善, 言必尧舜”, “欲平治天下”; 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岳飞“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征战沙场, 只为“还我山河”。自古以来, 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 矢志不渝。他们或忧天下之混乱, 或忧国家之衰败, 或忧民族之存亡, 或忧百姓之困苦。其所忧所患并非坐而论道, 而是将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 报效祖国的忧患之情付之于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 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正是由于无数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实际行动, 我们的民族才能历经磨难, 绵延千年而不衰。

所以, 无论从理论分析上看, 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它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之源。

其五, 强国意识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直接造就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主导价值取向: 忠君爱国、民族至上和整体利益, 忧患意识是其主导价值取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现, 那么, 强国意识则是主导价值取向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和历史方向。

首先,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强国意识表现在: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恪尽职守, 改造祖国山河, 创建辉煌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是具有

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老民族。在其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无数爱国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曾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二千多年前就修建了雄伟的万里长城,发明了造纸术;一千三百多年前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一千一百年前发明了火药……。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千五百年为止的世界科学成就中,世界最重要的发明创造有54项,其中,中国就有31项。英国人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人仅仅在科学技术方面就领先世界的发明有一百多项,从科技史的角度证实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伟大创造。所有这些成就各有其特点和特色,都是指向共同的目标:为了民族利益和实现国家富强。

其次,中国传统爱国主义中的强国意识表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自强不息,改革弊政,实现政通人和,推动社会进步。《周易·乾卦·象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屈原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爱国主义传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渗透着这种浓烈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选择锲而不舍、坚毅不拔地努力。这种强国意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化为气势豪迈的英雄主义,化为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外敌入侵,出现民族危机时,强国意识表现为不畏强暴,抗御外辱;社会矛盾尖锐,出现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时,有远见的政治家、改革家,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弊政,力图治国安民。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强国意识引导中华民族不断前进,激励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总之,中国古代的文明社会是直接从氏族转变为国家。血缘宗法制长期存在,自然经济与君主专制并存,以及所特有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把忠君与爱国并论,追求民族至上,崇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并由此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意识。

二、传统爱国主义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也是人们忠诚、热爱、报效祖国的一种融情感、理性和意志于一体的社会意识。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重要原因就是爱国主义传统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成为我们的精神血脉。因此,传统爱国主义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需要。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需要借鉴爱国主义的传统价值观。爱国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比如,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价值取向重视民族至上性,强调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首要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集中地代表着、体现着、实现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自洽。只要我们很好地继承传统爱国主义的合理内核,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之间会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现实的必然,是势在必然。所以,邓小平曾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3]由此可见,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需要。

第二,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小康社会”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它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确立的的奋斗目标,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必然会遇到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必然会遭受形形色色的困惑和考验。我们所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我们就需要借鉴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优秀价值,赋予其时代价值,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把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全民族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战胜各种

艰难险阻,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三, 它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复兴的源泉。

所谓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 即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 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 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既给民族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广阔空间, 同时也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造成巨大冲击。西方学者甚至断言, “就好像樟脑丸从固态直接挥发一样, 我料想在全球性的电脑国家掌握了政治领空之前, 民族国家根本不需要经过一场混战, 就已经消失无踪。……未来将越来越没有国家的发展空间。”^[4]

然而,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借鉴传统爱国主义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 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当今世界, 科技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进行的, 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 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因此,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时一定要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 这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发展的前提。同时, 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对民族的复兴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经济全球化并非经济利益一体化, 各个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强大的行为主体, 仍有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仍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与品牌, 维护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经济威胁。因此,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 爱国主义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有力保障。我们需要有效地借鉴传统爱国主义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毕竟, 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一贯以天下为己任, 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 造福人类, 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中华民族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美国兰德公司曾预测, 以中国的发展势头, 到2040年, 中国在经济上将成为相当于10个日本经济规模的经济大国。我们有理由坚信, 有效地借鉴传统爱国主义有助于这一发展趋势, 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四, 它是面临价值多元化背景中民族团结的纽带。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 社会关系的复杂和社会生活的丰富,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 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然而,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举社会主义旗帜, 全面构建小康社会, 迫切需要民族团结, 形成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主义, 是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是否有高昂的民族精神,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一个人没有精神不行, 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更不行。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 就等于没有灵魂, 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效地借鉴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能够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纵观五千年历史, 爱国主义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江泽民同志说: “在我国历史上,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一面旗帜, 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胡锦涛同志也说: “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 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 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有着特别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动员力。我们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 必要要借鉴传统爱国主义的价值。

同时,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在价值多元的条件下, 一些西方强国借助经济实力推行其价值理念, 企图动摇作为民族国家的传统思想。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的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规定: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 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 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的兴趣和机会, 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吃苦耐劳精神。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 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 就是成功的一半。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 以及宗教迷信。……”^[5]与此同时, 面对国人思想的多元化, 如何以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政治信心, 的确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传统爱国主义是最能发挥这种作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传统爱

国主义中的民族至上性，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因此，借鉴传统爱国主义，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有助于凝聚人心，瓦解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它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凝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坚强纽带。

第五，它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动力之源。

借鉴传统爱国主义，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传统爱国主义，非常重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人的价值是通过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基础。“黄帝作冕”、“仓颉作书”、“史皇作图”、“胡曹作衣”、“挥始作弓”等远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成命百物”、“明民共财”的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思想都强调把个人的生命活动与国家需要融为一体，在必要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勇敢地承担“平治天下”、“泽加于民”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对祖国爱得越深，历史责任感就越强烈，人生目标就越明确，人生信念就越坚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无一不是忠诚的爱国者。他们之所以能做出一番事业，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爱国之心使其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深深的爱国之情成为其强劲动力，个人人生价值也就从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当然，任何传统都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中国古代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同样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弘扬。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爱国主义中的不足之处。比如，传统爱国主义价值取向中所

重视的忠君爱国，是与我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这种忠君思想曾经形成发展成为愚忠。在现代社会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消失，我们就应该对此赋予其现代价值，做出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诠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传统爱国主义中存在一些不合时代精神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理性地正确认识传统爱国主义，防止把传统爱国主义理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源于所处地域和血缘关系的一种本能留恋，而缺少客观的理性分析。“这种爱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凭信仰和感情行事。……同所有的轻率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只能暂时地激起强大的干劲，但不能使干劲持久。”^[6]在当今中国社会，狭隘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基于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受害意识”，产生了“高度的敏感心理”。^[7]他们在对待我国与有关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时，往往寻求敌对、对抗、甚至暴力的解决方式。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盲目自大、只注重传统，仅仅看到爱国主义传统的优良一面，反而自诩为“保存国粹”，实则思想僵化。而另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由于强烈的民族自卑心理，则仅仅看到传统爱国主义中的糟粕，堕入了“全盘西化”的泥潭。因此，清醒地认识传统爱国主义十分重要，既要看到其精华，也不可忽视其中的糟粕。

总之，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基础。我们在分析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中，要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客观地理解，正确地认识其在当代重要的意义，才能既增加我们对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感情，又能以一种客观而理性的态度面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发挥其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方增泉. 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特征 [J]. 北京党史, 2009 (4): 34
- [2] 张岱年, 朱贻庭. 绪论 [A].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 [3]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4: 392
- [4] [美]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M]. 海南出版社, 1996: 278
- [5] 转引自中情局“中国十诫” [J]. 环球, 2001 (9).
- [6] [法]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M]. 商务印书馆, 1988: 268
- [7] 转引自乐山. 潜流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5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